

# 论袁殊对新闻学术研究的贡献<sup>\*</sup>

李秀云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初,兼具党的情报工作者、左翼作家、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多重身份的袁殊,积极发起并投身“集纳运动”。他辨析“新闻学”概念,为“新闻学”正名;领导创办新闻学术团体与新闻学术刊物,拓展新闻学术交流空间;提倡学校新闻,普及新闻学知识,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袁殊;集纳运动;新闻学术

**作者简介:** 李秀云,女,副教授,博士。(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300387)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008-6552 (2010) 03-0012-06

袁殊(1911-1987),湖北蕲县人,原名袁学易。袁殊的身份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后来又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还同日本特工建立了交换情报的关系,也曾利用加入汪伪政权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袁殊是左翼作家,1931年3月16日创刊“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袁殊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曾担任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社记者、中国联合通讯社副社长、外论编译社副社长;袁殊还是一位新闻学者,1928年后三次赴日留学,曾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新闻学,为我们留下《学校新闻讲话》(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记者道》(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新闻法制论》(上海群力书店1937年)等著作。袁殊克服其多重身份带来的种种困扰,积极投身新闻学术活动,对中国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清理“新闻学”概念,为“新闻学”正名

“新闻学”一词被中国人所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主办的刊物《译书汇编》,多次刊载“已译待刊书目录”,其中有“新闻学,松本君平著”字样。1901年12月,在日本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提及,“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新闻学”一词在中国境内报刊的出现是1903年8月,《〈民国日日报〉发刊词》说,“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1905年8月,郑贯公在《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也指出,“考日本自维新以来,改良教育,现东京政治学校之学课,必有新闻学一科”。上述文献中的“新闻学”要么介绍松本君平的著作《新闻学》,要么介绍日本出现的“新闻学科”,都没有对“新闻学”进行界定与论述。1919年11月,徐宝璜首次明确“新闻学”的内涵:“新闻学者,研究关于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解决之学也,故亦有人名之曰新闻纸学。”<sup>[1]</sup>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学”作为“新闻纸学”的代名词,已普遍被新闻学界所接受。

\*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新闻学术史”(05JC860014)的研究成果。

1918至1935年，中国新闻学完成其建立过程<sup>[2](76)</sup>。在中国新闻学诞生之初，袁殊就以一种高度的学术自觉精神，清理“新闻学”概念，为中国“新闻学”正名。袁殊主张，应当用“集纳”这个名词取代“新闻学”。袁殊曾这样介绍“集纳”一词的诞生经过：“创立‘集纳’这个名词，是三年前三数个当时自命为新兴集纳主义者的青年，在谈论国内报章杂志情况时，一时的感触所定下来的。随时便开始在一个小型的文化报道的新闻纸上应用起来。”当时，袁殊还曾向著名新闻学者谢六逸和任白涛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集纳学’便在无反对意见下，出现于中国学术界”<sup>[3](85)</sup>。

袁殊所说的新闻纸是指他领导创办的《文艺新闻》。袁殊等“集纳学”的倡导者充分利用这一舆论阵地，讨论和报道新兴“集纳运动”的一切问题和消息。1932年6月20日，《文艺新闻》第6版设为“集纳版”，并阐明将“Journalism”译成“集纳”的两点理由：“一、Journalism的解释，是：一切有关时间性的人类生活之动态的文字、图书、照像等，使之经过印刷复制的过程，再广泛地传布给大众，使大众在生活行为上，受到活的教养，而反映于其生存的进取与努力。二、因此，这学问，就不仅是‘新闻学’而矣；经营或编辑杂志，或别种类此的书籍等，只要具备印刷、广布、时效这三大原则的条件，就都是属于此的。自然这其中最主要的仍是‘新闻’。其次，新闻这名词在中国，已经公开的成为‘谎骗造谣’的别号了，而中国到现在为止的‘新闻学’，又没有一本是完全的真实的Journalism。因此，我们依于Journalism的真实的解说，乃产生了‘集纳主义’与‘集纳运动’的新称谓。过去，曾有人释译此字为‘拉杂主义’，这不但不正确，而且隐约的带了些绅士之轻蔑态度！因为，‘集纳’还必须要有精选与批判，这两个内容的条件。”<sup>[4]</sup>

1933年，袁殊专门撰写《“集纳”题解》一文。“集纳”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名称。是从英语的‘Journalism’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通常我们把关于报纸之经营与制作，以及研究报纸之社会发生，与社会之存在与发展的根据；这类门的一切理论与技术上的学问，总称之为‘新闻学’，而于英语的注释，则为‘Journalism’。”<sup>[3](83-84)</sup>袁殊认为，“新闻学”的说法很不确切，原因如下：

第一，“新闻”与“消息”（News）是同义语，“以‘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术，似嫌狭隘。”当然，仅用“报学”二字，就更狭隘了。

第二，Journal一字，语源于拉丁语Diurnal，原意是指为每日、日记，后来成为英文的Journal，又为账册、簿记、航海日志、日记等意，后又变化为日报或定期刊物的名称。“现在法国的报纸，也多称为Journal。而关于报纸的学术，报纸业，杂志等等，就统称为Journalism。新闻记者及杂志记者，则称为Journalist。”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Journalism一字，除了意指每日朝夕发行的日刊新闻纸以外，还包括定期刊物，如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月刊等等，所以，“如仅单纯的用新闻学或报学，实在不够作完全的说明”<sup>[3](84)</sup>。再看看属于新闻纸类的日报及杂志的内容，除了时间性的条件外，其次就是“集纳性”的各种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集、编制以及类别归纳等过程。而内容的质别，也绝非是单纯专一的。所以从前有人把Journalism译作“拉杂主义”，这在字面上讲，未始不可，但在字义上讲，Journalism完全是“报道”的意义：“报者，将事物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道者，即在报告上负有对社会的倡导批判的任务。所谓倡导批判，是根据客观事物的社会的需要，是有目的意识的，是在选择与取舍的，而到集纳的完成。至于‘拉杂’，意如凌乱蓬芜，瓦玉并陈，自失之于切当。”<sup>[3](85)</sup>

“新闻学”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并不是从“Journalism”一词直接翻译过来的，而是沿用了日本学者对“Journalism”一词的翻译。袁殊从词源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指出“新闻学”一词不能涵盖“Journalism”的全部内涵，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新闻学诞生之初，当更多的人以生吞活剥的方式全盘接受西学东来的“新闻学”时，袁殊对“新闻学”这一专有名词进行深入剖析，体现了第一代中国新闻学者的独立思考与学术自觉。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前提，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

的明晰更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础。袁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袁殊的“集纳学”,既包括了当时流行的“报学”的研究对象,也为“新闻学”注入了“报学”没有涵盖的“精选”与“批判”的内涵。在袁殊那里,新闻学不再局限于新闻采编技术与方法,而是将新闻事业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指明新闻事业的理想境界所在,也指出了“新闻学”研究可资深入的理想境界所在。

## 二、拓展学术空间,阐扬社会主义新闻学

新闻学术团体与新闻学术刊物是新闻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袁殊积极创建新闻学术团体,出版新闻学术刊物,拓展新闻学术交流的空间。

1931年10月21日,由《申报》、《时报》、《文艺新闻》的进步记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及复旦大学新闻系部分师生组成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袁殊是重要发起人之一。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的成立做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宣言》阐明研究会的创立动机:“对过去新闻学是不满足,对现在的新闻事业是不信任;在没有专门的集体的组织而发起本会,这就是我们诚挚的最初的动机。”《宣言》揭示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立场:“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中国新闻学研究会“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科学的研究外”,“更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新闻之工作者:自研究而从业,亦必须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我们认识这新闻学之研究的意义,我们要以对新闻之志愿与坚决的信心,投于这一巨艰的伟大前程。统一起中心的目标与意志,循着大的社会进化之征轮的踪迹;建立新闻学的基础,推进新闻学运动的开展;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任务。”<sup>[5]</sup>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立志在实践中践履“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新闻学”立场,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是充分关注大众利益的新闻学。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具有明确的研究纲领:“(一)从事于认识、研究并批判目前为止的过去的新闻学及新闻事业之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由是而(二)从事于探讨并求建立目前客观需要上的新兴新闻学及新闻事业上有历史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原则也包括两方面:“(一)关于原则之一者——清算过去新闻学一切书籍及各国各种记录新闻事业的史册,并不可忽略各国各记者或新闻家之著作与生平事迹,由分析各个当时的政治形态及社会生活,而取得其结论,在各种新闻机关之组织形态,经营方式,记事之采访的标准上取得研究的材料;(二)关于原则之二者——观察目前的社会生活的诸般现象,在阶级对立及其斗争日趋尖锐化的斗争行动中,审视现代新闻的阶级性,确定其存在的根据,并社会大众需要的程度。”<sup>[6]</sup>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注重对现实的批判,关注新闻事业领域的阶级斗争。1931年秋,上海《时事新报》辞退编辑部同人,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为此发表宣言:“希望时事新报离职同人及现在各大报馆工作的人员,认清我们的敌人——资本家、买办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一致地起来,施以体无完肤的总攻击。因为这才是我们光明的目的——言论自由,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其余像妥协调和,是事实上办不到的事,同时也是我们不屑干的。本会同入,力量虽甚微弱,但对此攸关中国新闻事业前途的事变,自觉义不容辞,愿为打倒操纵报界的资本家的先锋,深盼一切新闻界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携手前进,攫取光明前程!”<sup>[7]</sup>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具有较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意识。1932年5月30日,《文艺新闻》第57号刊载《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之过去批判与今后企图》一文,公开进行检讨:“自立会的消息宣言发出后,本身工作,始终甚少进展。”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几经聚集,检查“过去忽怠的工作及精神涣漫的错误”,总结如下:“(一)对现代新闻的理解及教养不够;所以没有充实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影响于全国的从事新闻职业的和从事新闻研究的一般同志,使他们能在正确的号召之下集体的团结起来。(二)全国的新闻

闻界，完全是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洋买办、资本家乃至口里倡导着‘民族’或‘民主’的党国等所扶御之下的；所以全国的记者们，也十之七八因此而为职业所奴隶了！不可讳言的，许多人之当记者、从事新闻事业，并不是立志‘为新闻’——为新闻是最大多数群众的——的；而是另有动机和目的。于是也就没有自身职业的自觉，没有进取探讨研究的欲念；而驯顺的作了那些为主人而狂吠、狂咬、狂奔于四处的狗卒的狗腿！根本没有自动的踊跃的来要求团结和组织。这是客观与主观的两大理由。”

袁殊还是上海记者座谈会的重要发起人。上海记者座谈会到底成立于1933年还是1934年，已无法具体考证，最初是由袁殊与恽逸群、陆诒几个青年记者聚在一起，以茶话会的形式讨论新闻学术上的问题。1934年8月31日，《大美晚报》刊载《座谈会的告白》一文，描述上海记者座谈会的建立过程：“‘记者座谈’这组合的形成，是远在数月之前。也无所谓谁是发起的主动者，不过有少数的朋友们，第一次相聚于一家俄菜馆中，经一次恳挚的深谈后，大家都认为此后每周应有继续座谈的必要。因为我们这般从事于新闻事业的青年，在日常的生活中，普遍地感到沉闷和饥渴……我们都是以新闻事业为终身志愿的青年，同时自认对现阶段新闻事业不感满足，而深愿为将来中国新闻事业迈进过程中的拓荒者！我们坚信非今后虚心地理头准备学识和技术上的增进，将来便不能完成新闻记者的新使命，不能肩荷起复兴中国新闻事业的艰巨责任。为了要解决‘沉闷’和‘饥渴’这两大问题，我们便联合志同道合的一群，从事组织记者座谈会。在这座谈席上，我们可以天真烂漫的无话不谈，同时也可以讨论各种有关新闻事业本身的问题和理论，也可以交换各人的学识和意见。这组织里，既没有领袖，也没有严格的章程，更毫无虚伪的仪式。”<sup>[8](81)</sup>1935年底，这个没有组织的组织曾起草“上海市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三十多人在上面签名。

从1934年8月31日起，上海“记者座谈会”发行《记者座谈》周刊，每星期五附刊于中文《大美晚报》发行。《记者座谈》致力于“集纳之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以求“唤起一般集纳学术研究的兴趣并指出研究的途径”<sup>[3](39)</sup>，从而“推进中国新兴集纳运动”<sup>[3](38)</sup>。袁殊曾描述《记者座谈》的目的与立场：“企图从学术和生活的自我教养中，在沉淀于半殖民地的黑暗的上海新闻从业的劳役里，活跃起来，矢志积极的学习我们所不知道的，认识我们所未认清的，说我们所要说的话，并抨击我们所要抨击的人事。而我们的态度，万分自好和忠厚，一面是醉心于智能的发掘，一面却也是顽强固执的不愿同流合污。”<sup>[3](39)</sup>在这种精神指引下，《记者座谈》进行了内容丰富研究：讨论新闻的用字与用语问题、小型报的发生与发展问题、印刷术与报业工程问题；介绍外国新闻事业概况，揭露西方列强在新闻方面的阴谋；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出版法作过严厉批判，并发表各地新闻界反对新闻检查，争取言论自由的消息和文章；也曾针对当时的黄色新闻和堕落记者群，进行激烈抨击。袁殊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了文章，后来汇集成《记者道》一书。

1936年5月7日，《记者座谈》宣告停刊，共出版90期。《记者座谈》停刊后，上海记者座谈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该会继续想方设法在《立报》、《大公报》、《大美晚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报道，团结了众多的青年记者，为后来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奠定了初步基础，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 三、提倡学校新闻，普及新闻学常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尚未被社会广泛了解与认可。中国第一代新闻学者任白涛、戈公振、邵飘萍、谢六逸、黄天鹏等都致力于新闻学知识的普及<sup>[9]</sup>，袁殊也是其中的一位。

袁殊总结了新闻研究的状况：“大家知道，新闻学在中国还不过十数年的历史；到最近，在出版

界里可以搜集得到的此类的文献,也是非常的有限,而且都几乎是‘概论’方面的著述或翻译。在已经有把新闻学成立为专门学科的学校,现在可以数出的也仅有三数大学而已。至于说,在这一方面有著述出版的人,或是有过专门研究的人,现在也是很少的。在十数年以来的新闻学运动的成绩,是这样可以看得见;可以被称为新闻学者的人,的确也太寥寥了。现在,向这一方面努力的人,是逐渐的在多起来……这就是很可喜的进步的现象。但是据我个人约略调查所得,现在有许多致力于此学的,大都只以得到一般关于新闻之经营的理论,及普通的新闻之制作技术后就认为满足的。这实在太简单了。”<sup>[10](162)</sup>新闻学界的这种状况自然影响到了学习新闻学者:“在中国一般的学新闻学的,大都是把最大的努力,放置在‘概论’上去。这在我个人觉得是未免简单了,而且轻蔑了新闻学。”<sup>[10](173)</sup>

袁殊认为,要想解决新闻学研究简单化、技术化这个问题,必须先认清新闻学的性质。首先,新闻学是一种科学:“新闻,是一种异常迅急敏感的一种属于社会群众的活动,关于它本身的理论和技术,是不像其他学问那样渊博深奥,而它却是广泛无际的……我们可以说新闻学并不深奥渊博,但在它涵有的一切里,却是真实而又真实的,科学的科学。”<sup>[10](177)</sup>其次,新闻学是一种实用科学。“每一种学问的目的,都有其实用性的。”“新闻学的目的,是为了新闻纸的。它亦是阐扬研究新闻纸之理论与技术的。新闻纸,在现代社会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人们每天之需要阅读它,是和需要吃饭一样的重要。所以:报是什么?报如何在社会存在?怎样办报?怎样办了报才得好或坏……由于这种种属于新闻纸之研究的而综合所成的‘新闻学’,是成了实用的科学的一种学问了。”<sup>[10](164)</sup>再次,新闻学具有时代性。“每一种学问都与时代社会的变迁互相因果的……新闻纸,在新闻学上理论的解释,是:‘传播思想,发扬文化,在时代前作大众生活的一种中心的中介机关。’所以,我们有志于新闻学之研究的,就是准备从事新闻事业——准备作这种人类社会中心的中介机关的工作者。我们在新闻工作的实际上,可以知道这种工作者所必备的技术的、学识的、理论的等等本身条件,而再从这条件之获得的这原则上去下功夫。这就是被称为‘新闻学’的此种学问的内容及其研究的任务。”<sup>[10](165)</sup>

针对新闻学的种种特性,袁殊指出,提倡学校新闻,在实践中学,是学习与普及新闻学的一种有效方法。社会有各种相互的复杂生活,“于是有了新闻,记录这生活的一切现象,表白社会进化的足迹,并为全体的社会人的活动作为流动总的‘中介机关’”,“社会发生的一切事象,直接可由新闻的报道,而间接的能在读者从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见地,通过影印的作用,而得批判的结果”<sup>[10](11)</sup>,因此,新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报道与批判。学校,在整个社会里占据重要的地位,学校是“一个学习准备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组织里特殊的学校社会”<sup>[10](10)</sup>,于是就有了学校新闻。学校新闻“是由学生本身主动的,在学校社会里的新闻事业”<sup>[10](9)</sup>。学校新闻“可以供给学生对社会活动的一个实际的实习。报道与批判,就是一切经验教训获得的来源”<sup>[10](12)</sup>。袁殊进一步强调,“学校教人以学理,新闻告人以实际”,“学生都将学理体验到实际上去,这就是从实验室、图书馆和课堂出发,向市场、工厂、乃至法院与衙门去,在这当中先构成一个交流的轻便的路线”<sup>[10](7-8)</sup>,那就是学校新闻。学校新闻,就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必要准备,而这一准备要在实践中来完成。但现实令人遗憾,他举例论证,某某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由他们的教授引导到报馆去参观,刚走进排字房,就有学生说那里空气太坏,不能久留。走进印刷间里,就有学生很在意那到处都有的油墨会弄脏了他们的西装裤。袁殊认为,这种“讲清洁的新闻学的有志者”,是在“污害”“新闻学”这个名词<sup>[10](174)</sup>。可见,袁殊一再强调新闻学是关切劳苦大众利益的实用之学。

1931年5月13日,袁殊为劳中新闻学会演讲,讲述自己“向 Journalism 之道”。童年的时候,袁殊曾在印刷所排字房做了7个月的学徒,在“铅字窖里”的埋首劳动,对他“作了最初的 Journalism 的教化”。后来,他连初中都未能毕业,但在两年多的学校生活中,又因与同学一起发行学校“窗报”(用手写,贴在宿舍寝室的窗门上)而获得了编报、办报的最初工作经验。后来,他在长江流域四处漂泊,

“曾有两度正式在报馆里干事”。有鉴于自己在实践中学新闻的经历，袁殊大力提倡学校新闻。他的《学校新闻讲话》介绍了日本、英美及中国的学校新闻概况，更对如何开展学校新闻提出设想：针对学校的办学实际，在有新闻学专科的学校，以新闻系的学生为中心，容纳非新闻系的有志于新闻的同学以及学校的所有职员、校工等，组织学校报馆，经营学校新闻；在没有新闻学专科的学校，由学生会的出版部发起组织学校报馆。但无论在何种性质的学样，报馆是一个独立机关，不隶属于学生会或者被“学校当局的权力所管辖”<sup>[10](16)</sup>。

## 四、结 语

袁殊身具情报工作者、作家、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多重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的系统性。1932年，他在《学校新闻讲话》后记中坦言：“《学校新闻讲话》，是我个人从事‘集纳’研究的处女出版……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始终未容许我有过‘埋头向学’的机会，对于这仅仅是一些潦草、杂乱的材料的贡献，是深深认为自憾的！”然而正因如此，袁殊的新闻学术研究成果，越发弥足珍贵。在充分关注现实，充分结合现实，并且力求改变现实的前提下，他“抱负了从事新兴集纳运动的志愿”<sup>[10](220)</sup>，积极发动并投身“集纳运动”。新闻学者任白涛在《学校新闻讲话》序文中赞扬袁殊“完全是个站在‘集纳’的立场的‘集纳’主义者”，他当之无愧！

## 参考文献：

- [1] 徐宝璜. 新闻学 [J]. 新中国, 1919 (7).
- [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 [3] 袁殊. 记者道 [M]. 上海: 群力书店, 1931.
- [4] 集纳正名 [N]. 文艺新闻. 1932-6-20 (6).
- [5]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宣言 [N]. 文艺新闻, 1931-10-26 (2).
- [6] 在这纲要指示下努力于新闻研究 [N]. 文艺新闻, 1932-06-20 (6).
- [7] 新闻学研究会宣言时新报被辞同人 [N]. 文艺新闻, 1931-11-9 (2).
- [8] 胡道静. 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 [M]. 上海: 通志馆, 1935.
- [9] 李秀云.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 [J]. 新闻记者, 2005 (1): 48-50.
- [10] 袁殊. 学校新闻讲话 [M]. 上海: 湖风书局, 1932.